

书院的历史属性及其当代启示

■ 石雨青 晏辰康

中国古代书院自唐代建立以来,便始终作为官方藏书、修书和知识分子学习、研究的组织机构。随着宋朝文人士大夫阶层社会地位的跃升,书院也随之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及至元代,大量民间私人书院纳入官学体系;进入明朝,书院文化开始传播至周边邻国,走向海外;晚清时期,随着清末改革书院发展逐渐式微。直到1949年,以钱穆、唐君毅为代表的新儒家前往香港,将宋代书院的价值内核与西方住宿学院制相结合,创立了新亚书院。这不仅成为他们振兴儒学、沟通世界的学术研究基地,更从此揭开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书院制改革的序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新认识古代书院蕴含的历史文化和教育智慧,深刻把握其内在的政治属性、育人属性和文化属性,对于完善我国高校现代书院制改革、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把握好书院的政治属性,实现理论铸魂与实践育人的有机统一

我国古代书院作为传承儒家道统、传播儒学思想的重要阵地,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早期唐代书院作为官方藏书、修书之所,本身就是统治阶级“赓续文脉”的重要体现。宋明时期,随着知识阶层的兴起,书院逐步发展为儒家学者讲学、论道、研究的理学重镇。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大儒都曾在书院中传道、授业、解惑。他们坚守儒家经世致用的人世理念,秉持以德为本的教育导向,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贯穿于书院的日常教学活动中,进一步强化了书院“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担当。古代书院讲学儒家经典,并非单纯的政治说教,而是将个人的道德培养与国家的治理实践紧密结合,彰显出书院教学活动始终与现实社会相衔接、与国家发展相适应的特点。这不仅促进了学术传承与政治教化的平衡统一,还使书院成为封建社会维护伦理秩序、凝聚文化共识不可或缺的组织力量。

立足今天,推进现代高校书院制改革必须坚持政治挂帅。第一,强化政治引领功能。现代书院要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担负起“明道、信道、传道”的政治使命,在日常教学管理中深化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浸润在师生学习、生活、工作的点滴细节之中,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穿书院建设和学生培养全过程各方面。第二,践行经世致用的办学理念。现

代书院应打破象牙塔与社会之间的壁垒,不要“闭门造车”。要主动融入高校社“大思政”育人格局,鼓励学生走进乡村基层、关注民生百态,到一线学习真知识、研究真问题、锻炼真本事,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要为学生搭建广泛的实践平台,组织学生深入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切实将课堂所学知识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在服务群众中见实效。第三,发挥培育时代新人的主体作用。现代书院发展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独特优势,要充分利用高校已经建设完备的住宿制和一站式学生社区等条件,将老师与学生紧密联系起来,从“台上台下”的师生关系深化为“面对面”“心连心”的亦师亦友关系,促进彼此间的思想碰撞,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现代书院成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的重要载体。

二、把握好书院的文化属性,推动学术创新与文化培育的相得益彰

中国古代书院在宋明理学家的推动下,发展建设兴盛一时。特别是在南宋朱熹等理学大家的带动下,一度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和历史传承的文化摇篮。历史赋予书院深厚的文化属性,使其呈现出“道器不二、体用贯通”的鲜明特点。经过制度化、规范化的建设,古代书院成为极具包容、自由、开放的学术研究之地典范。宋元明清时期的大儒,以书院为基地,对儒家经典进行研究、考据与传承;也以书院为平台,邀请不同学派的名家开展辩论、争鸣与讲学。因此,古代书院始终是主流学术思潮的滋生地和名家大儒的聚集之所。比如,南宋期间,朱熹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还曾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论语》。除了学术研究,古代书院也是承载文化复兴、涵养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作为中国土人的重要文化组织,书院的建设将中华文化基因深深刻进民间社会的细胞之中,对儒家文脉传承、学术体系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王阳明被贬谪贵州龙场期间,创建龙岗书院,向当地民众讲授“知行合一”学说,广纳学子,广收弟子,对推动贵州地区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现代书院也同樣承担着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培育文化自信的时代责任。高校应明确学院和书院的功能定位,以学院为基础,培育学生的专业素质和复合能力;以书院为载体,塑造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品格。一方面,要将学术创新与文化培育深度融合,既不能离开学术空谈文化,也不能只顾学术而忽视文化。文化培育也应依托学术活动的开

展,要用中华文化夯实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根基,以现代科学技术赋能中华文化的复兴繁荣,促进二者协同共生、相得益彰。另一方面,现代书院建设应结合所在高校的定位与特色,培育不同的文化品牌,加快构建多元包容、美美与共的校园文化共同体。要让现代书院成为学术创新的高地和文

三、把握好书院的育人属性,促进三全育人与五育并举的相辅相成

宋代以后,我国书院的发展受到禅宗丛林的影响,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人事制度和管理制度,分工明确,职责明晰,形成集藏书、讲学、祭祀于一体的综合性教学场所。书院里的书终终日与讲师同住共膳,潜移默化中养成了崇德向善的道德规范。在当今社会上,可以说,古代书院这种教育模式是某种全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早期实践形态。此外,古代书院对学生的教育除了要求深研儒家经典,还重视管理学生的日常行为,划定了明确的纪律约束。值得一提的是,古代书院注重生活多样、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比如,古代书院讲究“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治学方法,倡导克己复礼的内在准则,注重因材施教,鼓励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探索,还有各种体育活动和生产实践作为课余补充。这种办学理念与如今的五育并举教学思想达成了高度契合。

总的来看,古代书院的教育模式对现代高等教育破解重智育轻德育、重课堂轻生活、重专业轻素养的育人困境提供了很好的历史镜鉴。首先,现代书院应借鉴古代书院的办学模式,推动思政课程、辅导员、后勤管理者等育人主体走进学生的课后活动空间,定期与学生进行谈心谈话,在朴实无华的交流中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解答成长困惑,实现教学、生活的全方位覆盖。其次,高校应加快完善“书院+学院”的协同育人模式,打破一切客观限制条件和主观思想禁锢,支持多元主体扩大育人内容供给,创新育人形式,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广泛开展、系统推进独具特色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让学生在多样化的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中实现全面发展。最后,现代书院应秉持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注重发挥学生的兴趣特长,结合学生的个性特点,针对性地开展学业辅导、职业规划和心理疏导,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书院共同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成才道路,促进“三全育人”和“五育并举”的相辅相成。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胡志明对于建设越南社会主义的意义

■ 杜泽宇

胡志明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越南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离不开胡志明的付出。胡志明的一生始终在践行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为之奋斗终身。胡志明的社会主义观包含了越南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内容,是越南共产党在越南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经验总结和思想结晶。

越南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前行,本文在胡志明对于建设越南社会主义的意义作为研究对象,帮助更好地研究越南的社会主义发展,同时也为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一些新思路。

一、发展背景

越南是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在近代遭受了严重的侵略和压迫。然而,越南人民并未屈服,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抗战斗争。这场越南独立斗争不仅促进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更帮助了越南共产党去探索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胡志明作为越南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与越南的实际相结合,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越南的广泛传播。胡志明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引越南人民走向解放和繁荣。

胡志明不仅在越南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还与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是全球性的问题,只有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才能彻底推翻这些压迫者的统治。在胡志明的领导下,越南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推翻了殖民统治,建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

然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开始,后续如何巩固和发展这一制度是越南人民面临的新挑战。胡志明深知这一点,他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天,越南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越南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体现。这是胡志明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探索和付出的成果。

胡志明逝世后,越南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工业化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需要进一步促进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对越南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思想路线教育,将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旧的落后的殖民文化做彻底的斗争。

二、胡志明对于建设越南社会主义的意义

(一)胡志明对于建设越南社会主义的政治意义

胡志明对于建设越南社会主义具有深远意义,在政治层面,他将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统一,突出强调殖民地民族革命的重要性和能动性,指出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他准确分析把握越南社会的具体情况,从而去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他提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密切相连,但民族解放高于阶级斗争,并特别强调团结和统一战线策略,这一思想带有浓厚的本主义色彩。他特别强调革命道德的作用,其思维和表达的民族特色体现在通俗易懂和具体形象上,因此其政治贡献不可忽视。胡志明利用在越南共产党中的影响力组织了包括20世纪30年代初星期天运动和20世纪40年代越南独立同盟会在内的一系列反殖民运动,于1945年宣布越南独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这不仅为越南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也为整个东南亚反殖民斗争树立了榜样。在越南独立后,他积极推动越南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符合越南国情的政策和措施,如进行土地改革,工业化 and 现代化建设等。他注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通过土地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同时领导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建设基础设施,推动城市化。胡志明始终强调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将其两者与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统一的思想,以及提升了社会对农民作为革命主力军的认识。这一认识不仅激励了越南人民的独立解放斗争,也为其他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此外,他在国际舞台也发挥重要作用,积极参与全球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支持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和

三、胡志明对于建设越南社会主义的德风尚的意义

胡志明强调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他提倡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等社会主义道德观念,鼓励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他的这些思想对于塑造越南人民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推动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首先,胡志明强调爱国主义的重要性。他认为,爱国主义是每个公民应有的品质,是推动国家发展、维护民族团结的精神力量。他提倡人们要热爱自己的祖国,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这种爱国主义的倡导,有助于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

胡志明注重集体主义精神的培育,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人们应该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他提倡人们要发扬团结协作、互助友爱的精神,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这种集体主义精神的倡导,有助于形成团结、和谐的社会氛围。

四、胡志明对于建设越南社会主义德风尚的意义

胡志明强调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他提倡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等社会主义道德观念,鼓励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他的这些思想对于塑造越南人民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推动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首先,胡志明强调爱国主义的重要性。他认为,爱国主义是每个公民应有的品质,是推动国家发展、维护民族团结的精神力量。他提倡人们要热爱自己的祖国,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这种爱国主义的倡导,有助于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

胡志明注重集体主义精神的培育,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人们应该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他提倡人们要发扬团结协作、互助友爱的精神,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这种集体主义精神的倡导,有助于形成团结、和谐的社会氛围。

三、结论

回顾越南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可以得到许多启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同时,要坚定信心,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只有坚定信心,才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研究的缘起与演进

■ 李爱华¹ 胡杰慧²

当人工智能从实验室技术逐步嵌入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链条,一种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的资本主义新形态逐渐进入学界视野。自2019年“人工智能资本主义”概念正式提出以来,相关研究从思想萌芽到概念成型,再到多维度学术展开,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提供了关键切口。

一、思想萌芽时期

从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数据资本主义发展到人工智能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进步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形式。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兴起,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丹·希勒(Dan Schiller)提出“数字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揭示了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如何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且分析了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技术将社会关系全面转化为可量化的交换价值,重构了劳动、消费与权力的关系。进入21世纪,数字资本主义的演化呈现多维路径。一方面,随着大数据技术兴起,数据资本主义受到广泛关注。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等人在《数据时代》指出:“在今天的数字时代,数据的全面收集与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看待现实的新视角。”强调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和财富来源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另一方面,随着Uber、Airbnb等平台企业的崛起,推动了平台资本主义兴起。“平台资本主义”概念最早由加拿大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提出。他在《平台资本主义》中分析了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如何通过构建平台来积累资本,利用用户数据,协调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在数字经济环境下塑造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积

累模式。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渗透生产领域,学界开始探讨“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可能形态。与既有讨论相比,该视角不再停留于平台、数据与流量等表层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技术内核,聚焦智能算法、自动化流程如何重构劳动过程,剩余价值榨取方式与权力支配结构。特别是当人工智能日益演变为发生生产的“一般性条件”,它不仅推动生产力发生质的跃升,也重塑了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劳资关系形态等方面,使资本主义步入以智能技术为主导的新阶段。

二、概念提出时期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交媒体、金融、游戏等,但大多是以谷歌、脸书、亚马逊、微软等大型科技公司为主导,这使少数大型科技公司凭借对AI的算力资源、数据及人才的掌控,在市场中不断占据支配地位形成权力的集中。2019年加拿大学者尼克·戴尔-威瑟福德(Nick Dyer-Witheford)提出一个新表述:“现实存在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actually-existing AI-capitalism),它是由人工智能技术所驱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阶段,用以指代谷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大型科技公司借助人工智能所实现的垄断权力,这标志着人工智能资本主义概念的首次提出。

“人工智能资本主义”概念提出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加拿大学者皮耶特·沃德盖姆(Pieter Verdegem)对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出现做了更为详细的叙述,表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和技术转型为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政治环境来看,盖伊·斯坦丁提出的“全球转型”重塑了宏观

政治格局。他通过分析20世纪资本主义的演变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后,一种“全球食利者资本主义”逐渐形成,导致财富与收入日益向财产所有者集中。沃德盖姆进一步认为,这种资本主义构建了垄断性的寻租模式,致使市场被少数极具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所主导。在技术转型层面,21世纪以来互联网及相关数据技术(如社交媒体、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兴起,催生了学界所称的“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与“数据资本主义”,而“人工智能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演进而来。

三、学术发展时期

自维斯福特提出“人工智能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以来,学界对该议题的关注度持续提升。针对人工智能引发的工人失业、权力集中及社会不平等加剧等问题,学术界展开了广泛争论,焦点集中于该形态的内涵与外延、社会影响及发展趋势等方面。这标志着“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已从概念引入阶段,逐步迈入系统化的学术研究阶段。2020年以来,随着大批中国学者的加入,关于“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研究日趋深入。学者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技术哲学、社会伦理学与社会生态学等多重维度,共同探讨其复杂影响,极大地拓展了认知的深度与广度。

经过前期的学术积淀,未来该领域有望步入“体系化”发展的新阶段。不仅能为我们对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现实挑战提供理论支撑,也将为制定行之有效的治理政策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基金项目: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课题“职业教育发展专项—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职提质培优计划”(项目编号:0256-A1-8900-26-25)。

(作者单位:1.上海工程技术大学;2.东华大学)

网络舆论对公民政治认同的影响及引导路径研究

■ 王海宇

动以组织规范和政治过程的要求来约束自身的政治言行。政治认同,是凝聚人心的力量源泉,是激励奋进的思想支撑,也是社会成员共同向往的价值目标与精神家园。

罗尔斯将政治认同分为制度形式上的公共认同和非制度形式上的道德认同。有学者认为,“政治认同表现为多层次性,是一种递进式的心理认同和政治行为过程”,并将政治认同划分为具有递进关系的初级、中级、高级认同,还有人将其解构为身份性认同和理念性认同两个方面的意涵。

(二)网络舆论

网络舆论可从言语、情绪、行为三方面进行划分:

一是显舆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将舆论定义为“社会上值得注重的相当数量的人对一个特定问题表示的个人意见、态度和信念的汇集”。网络显舆论可理解为在互联网空间内形成的、关于特定事态的多数人共识性意见。二是潜舆论。潜舆论也是网络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潜舆论即指人民对于热点事件的非直观文字性的情绪反应。网络热点事件的传播与发酵过程伴随着强烈的情绪传递。社交媒体上不仅有直接的观点碰撞,更有情绪释放,网民通过表情包、图片等方式表达着情感化的立场与态度。潜舆论承载着多数人潜在的价值取向与态度倾向,一旦条件成熟,便可能外化为显舆论。三是行为舆论。搜索、转发评等各种有规模的网络行为同样是网络舆论的重要内容。人们在网络上的诸多行为展现着其对社会事件的态度、偏好。以微博平台为例,搜索频次、话题阅读、转发评数据量等都反映着民众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态度倾向和舆论扩散态势。

三、网络舆论对公民政治认同的影响机制

政治认同的形成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网络舆论对政治认同形成发展的全程都有着重要影响,可从知情、意、行四方面来分析其影响机制。网络舆论通过影响民众的认知、情绪,引发思考互动,形成一定的政治认同倾向,进而又影响其行为,民众的行为又进一步影响网络舆论发展,形成循环。

(一)知——信息交流

在网络空间中,由于网络空间的去中心化 and 身份模糊性,人们时刻能接收到巨量信息。每个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且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远超过往。桑斯坦指出,“群体之所以转移,关键的原因是群体成员所接触的信息”。人们在互联网上所接收到的信息会悄然影响其认知观念、态度倾向。而网络舆论通常是由社会热点事件发展而成,其影响范围和强度都比普通信息更大。网络舆论容易形成观点极化,形成一边倒的态势。

(二)情——情绪表达

信息的传播往往伴随着情感表达。网民通过讨论、点赞等方式表达对社会事件和政策的情感倾向,这些情感倾向会在网络中传播和扩散,影响更多人的情感。积极的网络舆论能够激发人们的正面情绪,增强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消极的网络舆论则可能引发人们的负面情绪,削弱对政治体系的认同。这种情绪影响着人们的态度倾向和政治认同程度。

(三)意——认同形成

在数字平台,群体成员更易展开针对特定话题的交流,人们在互动中逐步形成对政治体

系的情感倾向与态度认知,并在接下来的信息获取、传播分享与互动反馈中得以强化或削弱。一旦彻底形成认同,环境变化与新的信息输入对其影响会更为有限。

(四)行——相互作用

在形成政治认同后,人们的行为反应不仅巩固自身的政治认同,还会反过来影响网络舆论发展。例如主动发表帖子、积极转发带有鲜明政治认同色彩的博文等,这些行为不仅强化了个人政治立场,而且作为新的信息源,传递着特定情绪,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人的政治认同倾向,进一步塑造网络舆论的走向。

四、网络舆论对公民政治认同的引导路径

(一)实现有效信息交流

数字时代,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表达与互动等行都为被数字化留存,汇集成为庞大数据。这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引导网络舆论提供了技术支持。

一是官方媒体矩阵要作为有效的信息来源,深入把握各平台运营规则与传播规律,以有趣有效的方式传播真实准确的官方信息,增强正面内容的吸引力和覆盖面。二是官方媒体要对网络舆论及时反应、主动发声,对于恶意抹黑的负面信息要及时澄清、有力驳斥;对于民众反映的问题要及时表态、积极回应,并持续跟进处理进程,做到信息传递透明、真实、及时,在互动中赢得信任,在回应中凝聚共识。

(二)进行情绪引导

相较于已经形成的观念,对民众情绪的引导与改变更具可行性。“网络事件的产生和扩散,所依仗的是能够激发网民的嬉笑怒骂、喜怒

哀乐等情感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网络事件的发生,是一个情感动员的过程。”有研究指出,在国内危机事件中,民众最易出现的七种负面情绪分别是愤怒、悲伤、焦虑、恐惧、不满、怨恨和不信任。因此,政府要实时监控网络舆论,深入分析强烈负面情绪的深层次原因,及时开展情绪引导与心理疏导,疏解公众的不满与焦虑,防止负面情绪进一步发酵升级,同时建立健全情绪预警与回应机制,从源头上化解舆论风险。

(三)对话凝聚共识

在引导网络舆论的过程中,政府要妥善处理好负面信息和情绪,避免简单“一刀切”式的管控,应致力于引导公众以更具理性、建设性的态度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一个只存在单一观点的社群很容易走向极化,且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在于协调社会各方力量的力量,整合多元诉求,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这要求政府做到信息公开、决策透明,并积极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协商对话。因此,我们应当鼓励多样化网络群体围绕公共议题展开理性讨论,允许适度观点交锋,在碰撞中寻求共识,形成包容、开放、理性的网络氛围,从而推动社会共识不断凝聚,进而增强民众对政治体系的认同与信任。

五、结语

网络舆论是政府了解社情民意、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对舆论的有效引导有助于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推进科学民主决策。因此,我们应优化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路径,从信息交流、情绪表达、观念形成等关键环节入手,加强对网络舆论的正面引导,通过提高信息的真实性和透明度,增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和认同感;通过引导公民理性表达意见,减少网络暴力和谣言传播,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通过加强网络环境建设,健全参与机制,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获得感,从而形成良性互动的舆论生态。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